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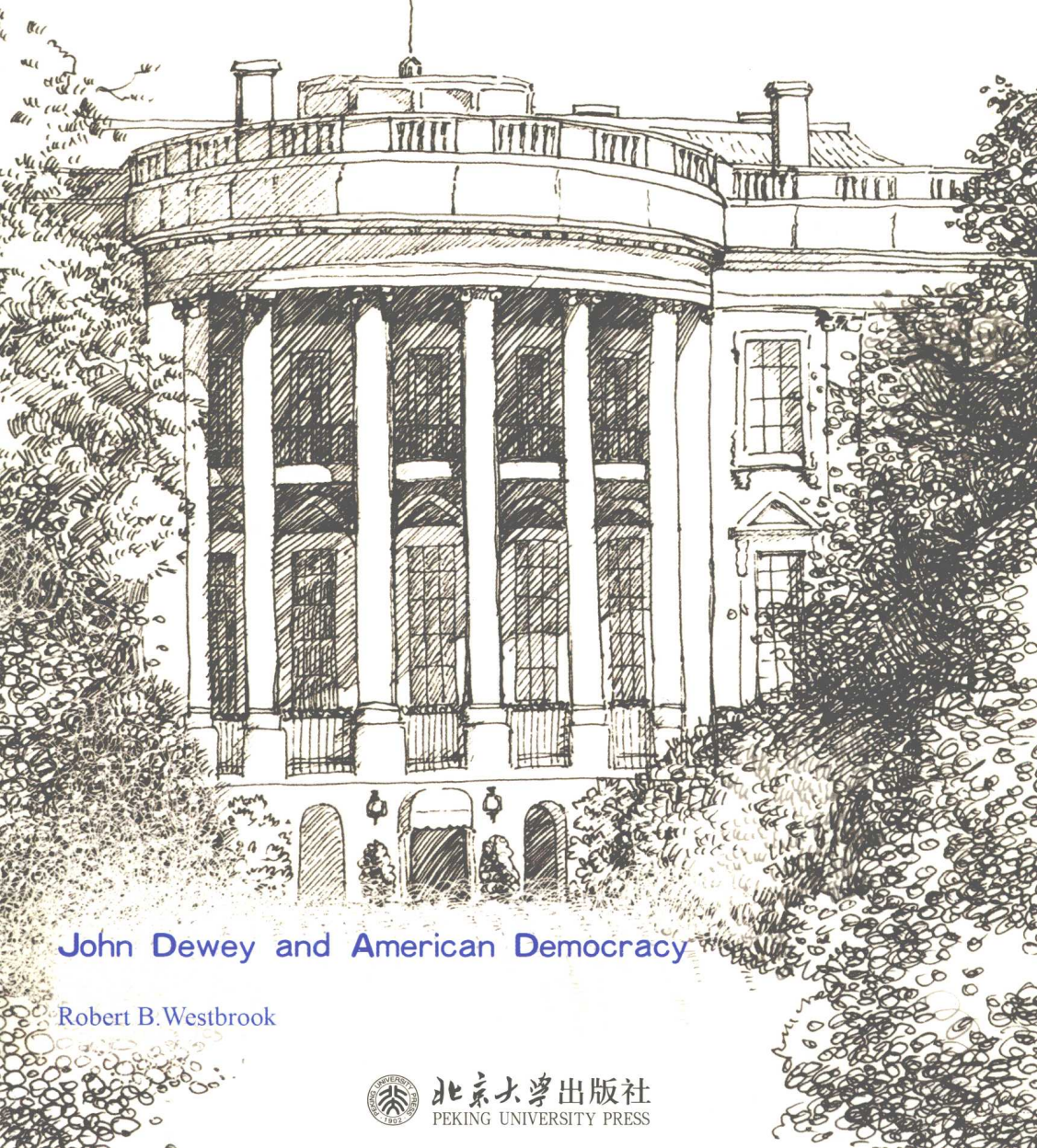
同文馆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杜威与美国民主

[美]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 著

王红欣 译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Robert B. Westbrook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同文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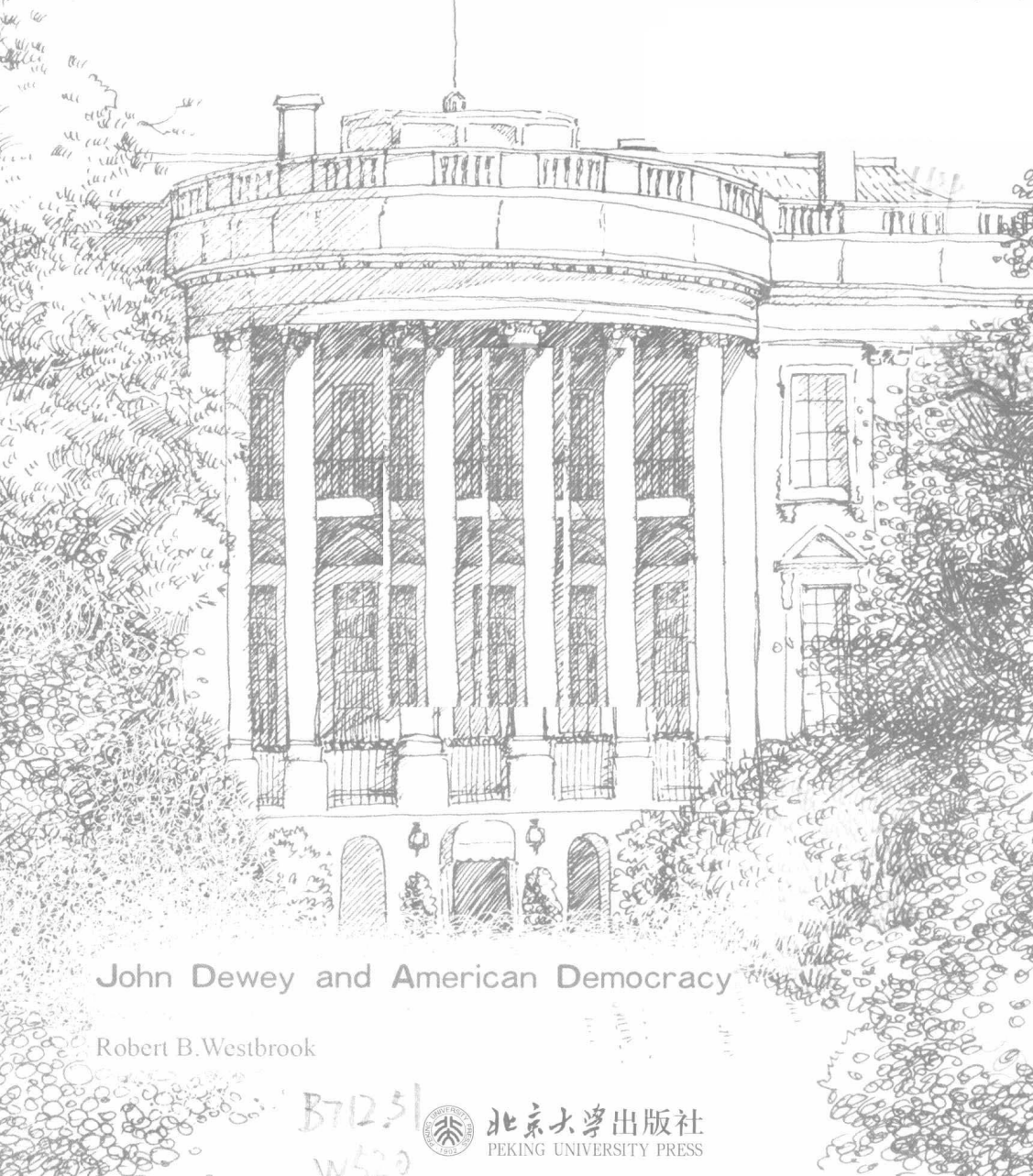
★ 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B712.51
W520

杜威与美国民主

〔美〕罗伯特·威斯布鲁克 著

王红欣 译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Robert B. Westbrook

B712.51
W520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7-29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威与美国民主/(美)罗伯特·威斯布鲁克著;王红欣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同文馆·实用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6386-3

I. 杜… II. ①威…②王… III. 杜威, J. (1859 ~ 1952) - 民主 - 思想评论 IV. B712.51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8223 号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by Robert B. Westbrook,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1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 杜威与美国民主

著作责任者: [美]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 著 王红欣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86-3/B·086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40 印张 6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致沙姆拉

了解我们如何看待杜威思想,就是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发现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查尔斯·弗兰克尔



本套丛书得到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主席聂圣哲先生的
赞助,特此鸣谢!

丛书主编

孙有中 安乐哲 彭国翔

丛书组织

王立刚

杜威归来(丛书总序)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再次对话

孙有中 彭国翔 安乐哲

新世纪伊始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似将成为这个世界各个层面的最重要的保障。不过这种被双方利益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关系并不稳固,甚至有时还很脆弱,并且由于中美文化间缺乏深入的理解,双方的关系亟待推进。要推进这一关系不仅需要能够传达共同价值和文化渴望的词汇,同样也需要一种能够表达相互差异的语言,这种差异使文化交流成了相互激发和丰富的契机。

这个译丛介绍的是对美国哲学的研究性著作,而且初衷是为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真正的本土哲学,在介绍的过程中,纠正人们对实用主义的流俗见:实用主义鼓吹的是权宜之计和投机主义,不配被视为伦理学。

这个译丛更大的雄心是鼓舞人们接续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的对话。为此,丛书的主编甄选出书目,经过相关领域的行家里手的倾力翻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最终呈献给中国学界和广大读者。

毋庸置疑,在美国哲学与中国的“夙交”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代表。就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杜威在其哥伦比亚的学生胡适和蒋梦麟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中国。当时胡适和蒋梦麟已经在学界和新文化运动中迅速崛起,成为重要的革新者。在华的两年间,杜威在华夏大地周游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体不惜笔墨,广为报道。但罗伯特·克罗普顿和吴俊生在其编纂的《约翰·杜威:中国讲稿 1919—1920》中说:“杜威在中国大学里的哲学学者中间没有赢得多少拥趸,他们在欧洲

受的教育,也继续师从德法的哲学潮流。”^①在当时烈火烹油的革命狂热下,杜威的思想被当时的激进听众望文生义地“误读”了。他们觉得杜威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更有效用,而非对专业的哲学领域。这种对杜威的误读只要不加以助长,是可以谅解的。^②

如今,我们有条件按照美国哲学本然的革命性品质对其进行重读,儒家哲学和美国哲学间的声气相通已被当代学界所察觉,在这两个传统中进行对话的里程已然发轫。

这一对话的开始之际,我们或许会受到这个事实的鼓舞: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移民怀特海说过:“要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要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③在《过程与实在》中,怀特海进一步指出,他的“有机主义哲学似乎更接近中国思想的某些流派”^④。可是,同样是这个怀特海,在其他地方也曾经有点大言不惭地宣称:在哲学活动中,有趣比真实更好。综合这两点来看,怀特海这种地位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将和他“同父异母”的同胞杜威和更具异国色彩的孔子加以串读(*tandem reading*),这即便不是作为真理的谷仓,而是作为启迪的源泉,或许更佳。不过,真理却是所有事物中离我们最遥远的。

怀特海对于他与杜威和孔子所共享的那种过程性的感受(*process sensibilities*),似乎多有忽略,并且,怀特海在事实上也显然没有深思作为“实用主义者”的杜威和孔子。在怀特海看来,杜威和孔子都服膺于那种他所认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naive empiricism*),而除了屏蔽掉最枯燥乏味的哲学探险之外,那种经验主义自身也乏善可陈了。怀特海在将杜威和孔子联系起来的审视中,重演了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1907)中辨识出来并加以说明的两难困境,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

① Robert Clopton and Tsuin-chen Ou, *John Dewey: 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3, p. 13.

② 见顾红亮《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亦可参见张宝贵《杜威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③ 参见 Lucien Price,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New York: Mentor Books, 1954), p. 145.

④ *Process and Reality*, Donald Sherbourne correct edition, N. Y., Free Press, 1985, p. 7.

的这一困境常常使我们的哲学进路遭受挫折。^⑤

怀特海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唯理论的基督教神学,通过真理的形式化而驱逐了新奇妙趣。他接着突然转而攻击杜威和孔子,说他们创造了一种逃避了终极问题的经验主义,而终极问题是经验中简单事实的基础。此处,怀特海将孔子和杜威明确地批评为这样一种实用主义者:即将兴趣局限在单调的事实上,从而遏制了这种大有潜力的情况:那就是所谓“愚蠢”和“多余”的问题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新奇思路。怀特海对孔子太苛刻了,在他看来,孔子导致了一个事物停止变化的时代,他责备孔子造成了中国文明的僵化凝滞。^⑥ 不过即便在他轻蔑的评论中,怀特海仍旧认识到儒家哲学的实用主义向度,这至少有助于鼓舞我们通过揭示杜威和孔子的深刻来捍卫这两位思想家,以对抗怀特海本人的傲慢。

事实上,在怀特海所处的时代,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同行来说,在杜威与孔子之间进行比较的任何思路都令人迷惑。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高度而言,我将论证:我们能够界定一套看起来毫无关系但实际上彼此相关的历史境况,多年之后,这种境况或许会得到权衡与考虑,并且,作为事后之见,或许还会被诠释为那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话。我们目前的世界是否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能够使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珠联璧合呢?杜威的归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这一次不再遭遇五四运动的漩涡,杜威能成为一股助力去推动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吗?随着七十多个孔子研究机构在全美国的建立,对儒家哲学的精微理解最终会到达美利坚的海岸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几乎全部是欧洲哲学,并且掌控了世界最高学府的坐席和课程,在波士顿、牛津、法兰克福和巴黎如此,在北京、东京、汉城和德里也差相仿佛。如果亚洲哲学和美国哲学在海外受

⑤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⑥ *Dialogues of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p. 176-177.

到忽略,那么在它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中,它们也同样被边缘化了。^⑦

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利坚,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等旗麾之下,西方哲学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这场批判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所罗门(Robert Solomon)的话来说就是“超越的伪装”(the transcendental pretense),诸如观念论、客观主义、宏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和“所予的神秘”(the myth of the given)。当然,在杜威所说的“哲学的谬误”(the philosophical fallacy),批判的也是同一个目标。“哲学的谬误”激发了杜威对观念论和实在论两方面的批判,杜威批评的是这样一种假定:一个过程的结果反而被当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因。^⑧

过去的二三十年,尤其在美国国内(不仅仅在美国),我们见证了古典实用主义兴趣的复苏,其标志就是对美国哲学演变的深入研究与

⑦ 诚如 Raymond Boisvert, *John Dewey: Rethinking Our Tim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一书中所论:在 20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曾荣耀一时,但其影响在二战之前就烟消云散了。Harvey Townsend 在其 *Philosophical Id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4) 中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美国哲学的状况:

美国哲学在美洲是一个受到忽略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部分地出于对欧洲的敬重。爱默生(Emerson)和惠特曼(Whitman)呼吁美国人思考他们自己的思想,歌唱自己的歌曲,他们的呼吁仍然被置若罔闻。无法完全说服美国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灵魂。

在随后两代人中,这种偏见仍旧显而易见。在《剑桥西方哲学史》(1994)的前言中,当提到该书不同部分的作者时,主编 Anthony Kenny 指出:“所有作者都受过英美传统的训练或授教于英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作者都属于英美的哲学风格。”但是,在该书的主体中却并没有提到美洲的思想,没有爱德华兹(Edwards)、爱默生、皮尔士、詹姆斯,也没有杜威。有关美洲所提到的东西,只有在索引中出现的“美国革命与柏克”、“托马斯·潘恩”、“杰斐逊”,并且杰斐逊在正文中是作为“潘恩的朋友”出现的。显然结论是:美国哲学,即使是接近英美传统的思想家们,在塑造西方思想特征的过程中也作用甚微。委实,在美国,很少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能够使学生直接受到美国哲学的认真而持久的训练。就像日俄战争是在日俄两国之外的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一样的,美国的大大学当前也基本上是各种外国学术角力的战场。

⑧ 杜威早就看到,作为“哲学思维最为流行的谬误”,就是忽略经验的历史的、发展的和情境化的方面。正如他所见到的,其中方法论的问题出在:“从赋予个别因素以意义的有机整体中抽象出某一个因素,并将这一因素设定为绝对”,然后将这一个因素奉为“所有实在和知识的原因和根据”(John Dewey, *Early Works* 1:162)。有关历史、发展以及“哲学谬误”的脉络,参见 J. E. Tiles, *Dewey: The Arguments of the Philosopher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9-24。

日俱增,其中最好的就在这个译丛之中,这些凸显了杜威的贡献的专论把杜威的特点总结为:将常见的语汇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加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当代学者们正在讲述一个重要的新故事,如今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杜威的中国学生没有真正理解他,其实扩而言之,如今的美国学生何尝不如此。

直至晚近,专业的西方哲学仍然忽略亚洲哲学而怡然自若(更不用说非洲和伊斯兰传统了),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是怎么回事并不在意,这些哲学只不过是他们脑海中一些匆匆而过的印象。西方哲学乞灵于这样的理由:那些思想流派并非真正的“哲学”。如此一来,职业产生了“比较哲学”这样一个术语。这是一个奇怪的范畴,它与其说是在哲学上得到论证,还不如说在地域上得到说明。

但是,在“经典与多元文化主义争论”的脉络中,由一种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推行“国际化”的明智需要所驱动,非西方的各种哲学传统已经我行我素地对哲学系的课程构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入侵”。从熙攘的世界会议到檀香山比较哲学的小圈子,再到波士顿儒家,比较哲学运动已经肩负重任,并且在目前看似巨大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中也创造了某些契机。对比较哲学运动来说,胜利仍旧遥远,但是,即使有朝一日当胜利到来时,那将会是一场仁慈宽大的凯旋之舞,也就是说,在这场斗争中,成功也就是将“比较哲学”这一别扭的范畴从哲学词典中废除而已。

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边,如今的中国不再满足于做世界的唐人街,而是正在经历着其悠久历史中最大和最彻底的变革。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清季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进以来,中国人广吸博纳以求富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在20世纪,马列主义经过几代人不断中国化,而刚开始的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儒学则被取而代之。同时,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许多杰出人物像张君勱、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从欧洲哲学(主要是德国哲学)中寻找标准,将中国思想视为二流的观念(*Chinese second order thinking*)论证为一种值得尊重的哲学传统。不过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而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

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

今天中国当代哲学有了明显的发展,从初期的康德、黑格尔,到现在的维特根斯坦,尤其是现象学和海德格尔。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兴趣转变对于儒家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对话的开启关系重大,尤其是对于本土思维的现代相关性,就更为重要。^⑨ 中国主权在 20 世纪中期的重新确立,以及最近几十年,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稳步成长,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更新的、批判的意识,以此作为自我理解的资源和平台,来应对被耽搁的但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

然而欧洲哲学曾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哲学,西方学术中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被中国学者公允地忽略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很难从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的思考中学到什么。过去的几十年,力图对中国文化进行转变和阐释的中国学者从关注被忽略的中国学者要贡献什么,扩展到了文化争论,并且对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也日益关注。西方汉学的翻译和讨论在中国获得了斐然的反响。

这种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条件环境已经为开启美国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之间的新对话搭起了舞台,儒家哲学随着中国人对其传统的自尊和自豪感的生长已经恢复了显赫的位置。这套丛书是我们以及中国学界同仁认为的当代美国哲学研究中最好的著作,是我们推动这一对话的努力。

彭国翔 王立刚 译

(编按:孙有中教授审读了丛书中《杜威与美国民主》、《造就道德》、《理解杜威》、《阅读杜威》等译稿;彭国翔教授审读了《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杜威与道德想象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等译稿。)

^⑨ 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本学术书,该书获得了出乎预料的欢迎。

前言

ix

1918年春,《思辨哲学杂志》主编威廉·托里·哈里斯收到了一份论文手稿,论文题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假说”,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的中学教师约翰·杜威。手稿上附有一封语气不太自信的短笺,请求哈里斯在对论文进行评判之余,评价一下“在这个方面,本人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是否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上面。”论文显示了作者相当强的逻辑论证能力,因此,几个月后,哈里斯的杂志上刊载了这篇论文,他还鼓励论文作者继续其哲学探索。当时,这位年轻教师的教学生涯进展并不顺利,而哈里斯的鼓励来得正及时,年轻人决定辞去中学的教职,从此把哲学作为自己的事业。^①

事实证明哈里斯的判断没有错。约翰·杜威将成为现代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将得到全世界的崇敬,也将遭受全世界的批评。杜威的哲学生涯跨越美国人生活与思想的三个时期,从19世纪90年代起,直至1952年他92岁辞世时为止,在历次的文化争论中,都可以听到杜威的声音。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杜威开创的哲学致力于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作为知识界的批判人士和政治行动主义者,杜威在自己的工作中例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杜威的哲学涵盖面广,他的事业异彩纷呈。杜威把人类经验的整体作为研究的领域,他对几乎每个哲学领域内的中心问题都进行过思考,他运用自己的哲学来直接应对美国社会中四处泛滥的具体问题,因为他认为,哲学家最重要的作

① 约翰·杜威致威廉·托里·哈里斯的信(JD to William Torrey Harris),1881年5月17日,转引自乔治·戴奎臻:《约翰·杜威的生平与思想》(George Dykhuizen, *The Life and Mind of John Dewey*, Carbondale, I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23页。

用就是“直面同时期的社会、道德争论,澄清人的观念。”“民主即自由”的道德信念是杜威社会理论的基石。毕其一生,杜威都在为这一道德信念构建令人信服的哲学依据,他一生都在践行行动主义,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一道德信念。^②

本书考察的是杜威弘扬民主的一生。如何理解问题、如何采取行动,诸如此类的问题曾经激发了杜威极大的热情,本人试图以这些问题为背景,把杜威的社会理论与其政治行动主义联系到一起。但是,此书称不上是完整的杜威思想传记。本书的重点是杜威的社会理论,特别是其“民主即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本书阐释了这一理想的意义,探讨了它在杜威的研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这一视角并没有乍一看来那样具有局限性。杜威一直在思考的民主社会的问题,甚至在他探讨看似遥远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美学问题时,他的思考似乎总能绕到这些问题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联上来。同时,杜威坚持认为,好的民主理论必须以深刻的哲学人类学作为基础,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经验根本特点的深刻剖析之上。杜威指出,“在我看来,有关社会与道德行为的任何理论,无论是自由主义理论与否,如果不能够以广泛的哲学作为根基,就只不过反映着个人随意的偏好。”因此,本人经常并不仅仅局限于杜威的明显具有“政治性的”观点和文本上,而是使论述延伸到狭义的民主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之外。不这样做就不能正确理解民主在杜威思想中的中心地位。如同杜威一样,本人总是在尝试探索杜威思想的各个侧面对于民主的含义。虽然本人对于杜威的评论还有不足之处,但是本人对于民主理论的重点关注触及了杜威哲学的核心内容。^③

从重要层面来讲,可以说本书是有关杜威的“杜威式”著作,因为文化史类著作是杜威所青睐的,也是杜威曾经使用过的写作方式。杜威认为“哲学的独特功能、问题和主题来源于共同体生活中的重点和特点,哲学来源于共同体的生活……哲学的具体问题随着人类生活中

② 《哲学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1920),《中期著作》,第12卷,第94页;“基督教与民主”(“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1892),《早期著作》,第4卷,第8页。

③ “经验中的自然”(“Nature in Experience”, 1940),《晚期著作》,第14卷,第150页。

的变化而变化,这变化持续发生,有时会形成危机,构成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由于本人与杜威的看法相同,因此,在探讨杜威民主理论的形成问题时,本人分析了杜威个人经历中以及上个世纪美国文化中所普遍存在的重点和特点。本人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杜威急切地试图理解并改变这个世界,同时,他遭遇到了许多知识上的、社会性的、政治性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杜威哲学。本人所做的并不是从引发杜威思索的事件中剥离出他的思想,而是再现引发杜威思索和行动的“问题场景”,有些场景平常琐碎,就如在 19 世纪 90 年代时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即将失去工作时的情景;有些场景则惊天动地,就如世界大战和革命场面。本人尤其关注的是,在哪些场景中杜威思想得以形成、转变、阐明,在何种情形下,杜威在对话、辩论时暴露出了不足。参与杜威的对话和辩论的人包括乔治·S. 莫里斯、G. 斯坦利·霍尔、威廉·詹姆斯、亨利·梅因爵士、弗兰克林·福特、简·亚当斯、伯特兰·罗素、大卫·斯内登、伦道夫·伯恩、胡适、S. O. 莱文森、瓦尔特·李普曼、乔治·桑塔亚那、刘易斯·芒福德、艾伯特·巴恩斯、哈里·威曼、艾尔弗雷德·宾厄姆、列夫·托洛茨基、悉尼·胡克、罗伯特·哈钦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以及(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他的第一任妻子——艾丽斯·杜威。尽管与杜威哲学相关的第二手资料长篇累牍,但是,对杜威的思想进行历史性研究还是一个尚待开垦的领域。也许这会令人感到惊奇,但在此方面,本人的作品的确不同凡响,因为本书第一次检视了杜威一生的民主理论与行动主义的发展状况。^④

或许应该强调,尽管本书采用的是传记式、历史学的写法,但并不

④ “序言:25 年之后的改造”(“Introduction: Reconstruction as Seen Twenty-Five Years Later”, 1948),《中期著作》,第 12 卷,第 256 页。关于杜威作为思想史学者的出色能力,参看理查德·罗蒂:“杜威的形而上学”(Richard Rorty, “Dewey's Metaphysics”),见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第 72—89 页。关于杜威的著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关杜威哲学最优秀的史学研究著作是尼尔·库夫兰的《约翰·杜威的青年时代》(Neil Coughlan, *Young John Dew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这本书研究的是杜威的早期生涯,当时他还是个新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尚未完全思考出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观点。

能为读者提供太多关于约翰·杜威的心理描写。因此,本书对于杜威的观察并不是杜威式的。杜威经常说,思考只是人的第二属性。个人的第一属性是“行动者兼受动者、施事者、受事者和接受者”。遗憾的是,杜威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其个人的痛苦和欢乐的记载。当我认为杜威的内心世界、个人生活有助于解释或阐明他的思想时,我就会利用现有的证据,但是我们对杜威的个人生活还是知之甚少。由于证据不足,我不相信心理传记作家有可能成功写出杜威的传记。我曾试图解释,在特定的事件中,杜威为何能够那样想、那样做,但是由于受到证据数量的限制,我的解释比我预想的多出了许多推测的因素。在本人看来,杜威的一些重要观念都像是信仰行为的产物——在面对无法给出定论的证据时,杜威会运用“信仰的意志”——这些都有待于心理学论证。^⑤

但是,本人对于自己有关杜威思想的阐述,即对其思考内容的阐释,还是大有信心,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本书所阐述的内容与普遍的正统观念有所不同。这种信心或许有些自不量力,但是,本人之所以有如此的信心,是因为系统研究过了现有的已经出版及尚未出版的文献资料。本人的研究表明,许多对杜威社会思想著书立说的人并未足够仔细地研读他的著作。本人认同莫顿·怀特的观点,即“如果想谈论哲学观念的原因和结果,你最好要了解那些观念是什么,”同时,我也赞同怀特所做出的批评,即美国的思想史学家过分急于探究观念的原因与结果,因此而未能认真分析观念本身。其结果是,虽然他们的研究分析了某些观念的来源与影响,但是这些观念从来不属于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⑥

viii

⑤ “简论实在论”(“Brief Studies in Realism”, 1911), 见《中期著作》, 第6卷, 第120页。对杜威感兴趣的心理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其艰难程度可以从库夫兰所做的努力中略见一斑。库夫兰的思路很巧妙, 他在对杜威的内心世界做出推断之后, 并未到有关杜威心理的零星证据中寻找证明, 却转而研究乔治·赫伯特·米德的有丰富文件记录的内心世界, 这种尝试并不太令人信服, 但是库夫兰希望我们相信, 杜威与米德的内心世界具有相似性。参见《约翰·杜威的青年时代》, 第7章。

⑥ 莫顿·怀特:《美国社会思想:反形式主义》1976年版的前言(Morton White, “Foreword for 1976,”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 3r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第xiv页。

充分了解杜威的观念是困难的,因为,杜威的文风并不算准确、清晰。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曾经说过,杜威写作的方式就如同“上帝迫切地想对你解释某件事情,但却口齿不清,”这也许是对杜威的晦涩文风最尽人皆知的评论了。然而,杜威的文风并不比许多其他的现代哲学家更加晦涩(他要比某些哲学家更易懂一些),只是与同为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威廉·詹姆斯的非凡的文学才华比起来,杜威的确有些相形见绌。正如埃德蒙·威尔逊在评论中所说,理解杜威著作之所以困难,大部分原因在于,杜威喜欢“用抽象概念做出概括。”若想了解这些抽象概念所指示的意义,就必须认真研究杜威本人对这些概念的定义,要避免使用不甚合适的替代性词汇。有关杜威思想的著作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类似科学智慧、社会控制、调适等关键术语未能给出符合杜威本人意图的解释;由于对于这些关键术语的解释并不符合杜威的意图,所以有些杜威著作的阐释者所提出的见解是杜威所明确反对的。当然,杜威的意图并不总是清楚的,其观点也并非总是一贯而明确的。在一些关键之处,杜威并非总能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这样就使读者产生了新的理解。其实,在杜威的晚年生涯中,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去批驳对其作品的种种误读。当然,这些误读是可以理清的,这也是本人的目的之一。而与他人相比,本人对杜威的民主理论的阐释是否更加合理,这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本人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本人对杜威思想的阐释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现在应该重新评估杜威在现代美国文化史中的地位问题。^⑦

⑦ 马克·德沃尔夫·豪编:《霍姆斯—波洛克书信集:1874年—1932年霍姆斯法官与弗雷德里克·波洛克之间的通信,1874年—1932年》(Mark DeWolf Howe, ed., *Holmes-Pollock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of Mr. Justice Holmes and Sir Frederic Pollock, 1874-193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第2卷,第287页;埃德蒙·威尔逊致小亚瑟·施莱辛格的信件,日期不明,(Edmund Wilson to Arthur Schlesinger, Jr.),见威尔逊:《文学与政治通信:1912年—1972年》(Wilson, *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1972*, ed. Elena Wils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第198页。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主义者对抽象术语有特殊的偏爱,这“既拓宽了思想的广度,又掩盖了思想的内容”。托克维尔指出:“抽象词汇就像装有假底板的箱子;你可以随意把思想放进箱子,并且在别人注意不到时再把它拿出来。”见《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第2卷,第481—482页。